

林
庚
著

西 游 记 漫 话



清
华
大
学
出
版
社



林 厦 著

西 游 记 漫 话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 京



林 庚 字静希，著名诗人、学者。原籍福建闽侯（今福州市），1910年2月生于北京，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，并留校任教。1937年后历任厦门大学、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。

1933年秋，林庚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《夜》。1934年以后，他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，共出版了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他》等七本诗集。作为学者，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唐诗、楚辞、文学史等方面，共出版著作十一部，其中《天问论笺》获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。他将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完美地统一起来，显示出诗人学者的独有特色。

林庚诗文集单行本

林庚诗集

中国文学史

林庚楚辞研究两种

诗人李白

中国文学简史

中国历代诗歌选（先秦至隋代）

中国历代诗歌选（唐五代）

唐诗综论

西游记漫话

林庚推荐唐诗

空间的驰想



林庚诗文集（精装本）

责任编辑：马庆洲

装帧设计：宁成春 范昊如

出版说明

林庚，字静希，原籍福建闽侯（今福州市），1910年生于北京。1928年，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，两年后，转入中文系。在校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，活跃于诗坛。1933年毕业后，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到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，1941年晋升教授。1947年回京，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52年，全国院系调整后，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，直至荣休。

林庚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人、学者。为了集中反映其创作及学术成果，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2月推出了九卷本《林庚诗文集》，可以说，林先生的主要著作已基本尽集于此。《林庚诗文集》的立项受到出版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，新闻出版署将其增列为“十五”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。该书出版面市后，也受到读者的欢迎。然而，《林庚诗文集》毕竟是大部头的合集，对不少读者而言，购买一套颇不轻松。有鉴于此，我们决定将《林庚诗文集》中的著作拆分，以单行本形式出版。

此次出版我们在各书的分合及名称上做了些许的技术处理，与《林庚诗文集》相比，具体变动如下：一、将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上编分为“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（先秦至隋代）和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（唐五代）两种。二、合《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》和《天问论笺》为一册，更名为《林庚楚辞研究两种》。三、将《夜》、《春野与窗》、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

他》、《问路集》和《集外集》中的诗歌部分合为一编，定名为《林庚诗集》。四、《空间的驰想》原版为先生手迹之影印，收入合集时因版面需要改为排印，今复其旧，并拟以线装形式出版。

为了让广大读者更为充分地了解林先生著作的内涵和精神，我社特意约请了孙玉石、彭庆生、林东海、陈平原、张鸣、钟元凯、徐志啸等几位知名专家、学者，为每种著作撰写了“导读”，以便对年轻读者起到桥梁作用。在此，我们特致谢意！

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林庚先生的亲自指点，对各书的分合及定名，先生都给予了首肯。袁行霈先生自始至终关注着丛书的进展，给以大力指导，并慨然应允我们将其《燕园南 62 号——记恩师林庚》一文作为本套书的《总序》。在此一并表示我们的谢忱！

林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，而我们水平有限，编辑出版过程中，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疏漏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清华大学出版社
2006 年 3 月 30 日

总 序*

袁行霈

燕南园 62 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，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，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，窗棂雕了花的，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，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。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，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，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，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。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，右转，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，那里东、南、西三面都是窗子。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，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。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：“蓝天为路，阳光满屋”。

静希师到燕京大学任教时，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。但他喜欢平房，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，便换到 62 号来。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，春天，鲜花布满整个院子，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。

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，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。他喜欢体育，常看的是体育节目。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，第 26 届世乒赛期间，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，他的家成了演播厅。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，摆成一排排的。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，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，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。没有转播的时候，那些座位也不撤掉，等待着另外一场观众。就在这次

* 本文系袁行霈先生为庆祝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所撰，原题为《燕南园 62 号——记恩师林庚》。今征得袁先生同意，作为本丛书总序。

比赛结束以后不久，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，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，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老师的眼神好，对球的感觉敏锐，处理球的手法细腻，会突然抖腕发力，改变球的方向，使我招架不住。他还喜欢唱歌，原来只见他有一台相当讲究的电唱机，以及若干老的声乐唱片。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会美声唱法，能唱到高音C。大概是得益于唱歌，他原先的哮喘病，进入老年以后竟然痊愈了。他曾热心地教我发声的方法，还画过一幅头腔图，告诉我源自丹田的气如何经后脑绕过头顶，灌向鼻腔和口腔，以发挥头腔的共鸣作用。

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，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，进出这客厅，在那里向老师求教，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。其实我之留校任教，也是林先生亲自选定的，正是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当我毕业后不久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时，静希师还有钟芸师、一新师兄都去听课，课后便到林先生的客厅里小坐，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点。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，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，写字台中央有一方砚台，一个玉雕的水盂，还有一个方形的笔筒，瓷的。在书房里，我们距离更近，谈话也更亲切。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，当然多的还是学问，屈原、李白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，以及外国的文学，不管甚么话题，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。有一次谈到孙悟空，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。有一次谈到水分，他说如果没有水分，干巴巴的东西有甚么意思？《红楼梦》里写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“水葱”似的，这“水”字就很好！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上部，为了培养我的学术能力，让我负责初盛唐部分的初选和注释的初稿。那年我才26岁，对老师的信任格外感激。在选注过程中，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。他告诉我杜甫的《新安吏》一定要选，其中“肥男有母送，瘦男独伶俜。白水暮东流，青山犹哭声。莫自使眼

枯，收汝泪纵横。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。”这几句写得特别好。特别是“眼枯即见骨”，很有震撼力。我仔细体会，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。他还告诉我，李白的《独漉篇》，别人都不选，我们要选。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，经老师指点，细细读了几遍，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，末尾四句：“罗帏舒卷，似有人开。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。”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，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，非李白写不出的。又如，他说杜甫的那句“即从巴峡穿巫峡”，过去的解释不妥。三峡中的巴峡在下，巫峡在上，杜甫出川怎能从巴峡穿过巫峡呢？他引证古籍中的材料，证明这首诗中的“巴峡”乃是巫水流向长江的那一段山峡，因为在巫山中间，所以又称巫峡。经老师这样一讲，诗的意思就豁然贯通了。

回想起来，在我追随老师的这么多年里，他固然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，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给了我一种眼光，一种鉴别的眼光；还教给我一种方法，一种直透文学本质的方法。搜寻我的记忆，他从未对我耳提面命、厉言疾色，而总是在启发我鼓励我。他对我所作出的学术成绩，从不当面夸奖。当我出版了新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，他也从不说些别人在这情况下通常会说的客套话。但我请他为我的《中国诗歌艺术研究》撰序的时候，他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，而且很快就写完给我。在短短的篇幅内，叙述了我们师生的情谊和学术的交往，并对我书中的内容，提要钩玄略加评论。其论述之精当，语言之隽永，口吻之亲切，气度之潇洒，置之于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。

静希师一生提倡少年精神，他常说：人在青年时代最富有创造力。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他鼓励我抓紧时间作出突破性的成绩，可惜我未能做到。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，要追求突破，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，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。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“盛唐气象”的坚持，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，遭到强烈的反对，但他

从未放弃，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。

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，并让我评论。我特别喜欢他 51 岁时写的那首《新秋之歌》，诗的开头说：

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
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
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
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

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。他鼓励年轻人飞翔，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。诗的结尾是这样的：

金色的网织成太阳
银色的网织成月亮
谁织成那蓝色的天
落在我那幼年心上
谁织成那蓝色的网
从摇篮就与人作伴
让生活的大海洋上
一滴露水也来歌唱

这样铿锵的韵律，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，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，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。八十年代前期，我曾热衷于写旧诗词，他也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旧诗词给我看，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，但他并不看重这些，他要用现代的语言，创造新的境界、新的格律、新的诗行。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：“你真该学习写新诗！”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写旧诗上有点可惜了。我于是也跟着他写了一些新诗，可是总也写不出那样新鲜的句子来，这才知道新诗的不易。

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，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，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，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

极致。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，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；他有童心，毫不世故；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，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。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《空间的驰想》，是诗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结晶。在这本书里，他推崇人的精神，歌颂精神的创造力，他希望人类不要被物质的“灰烬”埋葬，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。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，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。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、博大的胸襟，以及始终不衰的少年精神，支持他度过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，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。

静希师的学问和他的新诗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用一般文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，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高超的。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每一版都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，其特色和价值，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，香港有学者在一本评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专著中，对静希师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用了很大篇幅详加论述并给与高度的评价。静希师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，关于《天问》是楚国诗史的阐释；关于唐诗的多角度的论述，特别是关于“盛唐气象”的精彩发挥，以及关于李白“布衣感”的揭示；关于《西游记》文化内涵的新解，以及其他许多见解，在提出的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，至今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。但仅仅讲这些还是难以看出他可贵的独特之处。他可贵的独特之处，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，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，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，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。他对《楚辞》的研究解决了如何从散文语言中创造诗歌语言这样一个重要的、从未被人注意过的问题；他对“建安风骨”和“盛唐气象”的提倡，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，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。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早已得到公认，但他在新诗创作上探索的成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，他也许会感到一点寂寞，但仍处之泰然，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

来检验的。我相信他的新诗创作，他对新诗格律的创造性探讨，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并在今后新诗创作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作用。

静希师在燕南园 62 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。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，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，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！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，他不要我搀扶，自己昂首向前，步履安详，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。

他曾告诉我，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。他一辈子都昂着头，而昂着头的人，精神是不老的！

2004 年 9 月 25 日

导 读*

陈平原

作为现代中国有数的著名诗人，林庚先生 40 年代起转治中国文学史。不难想象，一般读者对其著述的期待，大都集中在诗论部分。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，并非毫无来由。从最初独具特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到日后逐渐学院化的《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》、《天问论笺》、《唐诗综论》，其中最精彩的，确实多属诗论（关于“兴亡史诗”以及“盛唐气象”的论述。）

这就难怪，当燕园里纷传林先生正在撰写有关《西游记》的论著时，朋友们大都只是作为逸闻，并没真的在意。直到接获赠书并仔细拜读，方才大吃一惊。如今书已问世八年，好几次想向读书界郑重推荐，只是苦于无从落笔。这不是一般的专业著述，而是诗人“用心”写作的大书，必须排除杂念（包括所谓的“学术通则”），同样“用心”去体会，方能真正味出其“妙不可言”。

除去三则旧文，主体部分的《西游记漫话》，只有七万馀言。在动辄数十万字的当今学界，这只能算小册子。没有版本考据，没有文献征引，没有研究综述，作者直面本文，沉潜把玩，含英咀华，然后自说自话，根本不理睬业已成型的众多“体系”。其论说姿态，与其说是学者，不如说是行吟诗人，或孤独的散步者。

作者立说的根基，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：“《西游记》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。”这本不算创见，从胡适起，不断有人谈及此书

* 本文原系陈平原先生撰写的书评，题为《诗心与童心——读〈西游记漫话〉》，今征得陈先生同意，作为本书的导读。

的游戏性质与童话氛围。问题在于，早已心智成熟的学者们，与童话的天真烂漫格格不入，很难深入体味。林著之卓尔不群，说到底，缘于作者沉醉其间，故别有会心。

作者历来喜欢童话，就连与童话相关的各种动画片，也都令其入迷。以此童心未泯的天性品读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、猪八戒以及众多可爱的小妖怪，不再只是研究对象，更是人生路上不可少的好朋友。在《后记》中，作者称：

十年动乱期间，夜读《西游记》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。一部《西游记》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，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，对于其中的细节，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。

不是因为专业研究的需要，纯属压抑不住的好奇心，以及对老朋友的感激之情，促使时已退休的诗人林庚，突发奇想，大谈起小说来。

对细节的熟悉以及对人物的体贴，使得林著信手拈来，皆成妙章，此尚在其次。称孙悟空、猪八戒旅途生活中的调侃戏谑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喜剧性冲突，乃“既有一定的生活原型的依据，又可能与取经故事经历过的戏曲化过程有关”（113页），因“中国古代的戏曲，从唐参军戏到宋金杂剧和院本，一直都具有较多的调笑滑稽的色彩，插科打诨是其中最重要的至少也是不可或缺的成分”（68—69页）；或者从明代的社会思潮中寻找“孙悟空自由不羁、超越一切束缚的精神状态”之由来（96页），尤其注重李贽的“童心说”，这些言之凿凿的论述，虽也精彩，但别的文学史家也能做到。

最能体现论者性情，也最让人拍案叫绝的，其实是“童话的天真世界”一节。作者着重谈了三个问题，一是游戏的意味，二是小妖的功能，三是即兴式的花样翻新，并断言三者皆指向儿童的心理特征。

在作者看来,按阶级斗争观点解读《西游记》,不能说全错,但难尽得其神髓。不是说其中没有正邪之争,也并非抹杀孙悟空与众妖怪在道德境界上的差别,而是小说中许多精彩场面,无法单纯以“正义战胜邪恶”来解读。

作者认定,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“所以那样轻松自如,胜任愉快,正因为他将这一切出生入死的经历都看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而已”。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,“生而复死,死而复生,也全凭一时的需要和兴致”(99页),就好像小孩捉迷藏,彼此间的格斗不存在真正的危险。成人读者普遍过于认真,非努力发掘争斗之微言大义不可;可孙悟空与妖魔以及诸天神的角逐,常带有游戏意味。比如,与二郎神追逐,土地庙外树起了旗杆;钻到老妖肚子里打秋千,树蜻蜓,翻跟斗——这些都属于顽童的恶作剧。此类争斗,实为游戏的延续和发展,其中含“天真的情趣与幽默的态度”,“不能看得过于认真,看得过于认真了,便不免大煞风景”(102页)。

与习惯忠奸对立黑白分明的成人思维方式不同,在注重游戏的儿童世界里,不少对立是可以消解的。如与孙悟空处于对立地位的小妖,其天真烂漫仍能赢得儿童的喜爱。同样摹写战争场面,《西游记》的特出之处在于,无关紧要的小妖占相当的篇幅,且给人留下生动的印象。那撞上厅来通报消息的小妖,先“把个令字旗磨一磨”;还有那“敲着梆,摇着铃”,口中念念有词,实则有口无心的巡山小妖,一如快乐的儿童,其调皮与稚气,都让人忍俊不禁。在林先生看来,如类场面,“对立的双方最终都统一在童话的天真烂漫的情调中了”(108页)。

《西游记》以想象力丰富著称,可小说中有许多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,而读者竟不加追究,认可其依情境的转移而改变人物降妖伏魔的本事。孙悟空有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,有时又降到凡人的层次,陷入本不该陷入的困境。作者认为,这种不确定性,正是童话的积极因素,“造成了《西游记》中想象的创造性与无限

性”(110—111页)。假如严格按照成人的逻辑,孙悟空既然有通天本事,西天取经,该易如反掌才是。要真是这样,小说还有什么可看?

《西游记》的好处恰恰就在于写出了孙悟空层出不穷的新的方法和手段。他的行为从不落于一种格式,你无法预料他接下来会做些什么。他的行动中充满了即兴式的花样翻新与尝试。(110页)

童话中的想象,不必讲求合乎逻辑,此乃情节千变万化的前提。反过来说,读者之认可孙悟空忽大忽小、忽圣忽凡,正是默认了小说中“所包含的童话性”。

林著之解说《西游记》,选择了儿童的视角,以“童话性”作为立说的根基,有学理上的考虑,但更与作者的个人兴致相关连。极度的好奇心、无边的想象力、以及对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向往,是童心,也是诗心,更属于保持童心的诗心。

1998年8月9日于石河子